

明清史稿

戊編 上冊



明清史料彙編 上冊

中華書局影印出版

明清史料戊編

(上、下冊)

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秦皇島資料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 • 65 1/2 印張 • 1500 千字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秦皇島第1次印刷

印數 1-2100 冊

統一書號: 11Q18 • 1438 定價: 26.00 元

影印說明

《明清史料》係有關明清兩代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民族、法律等方面的原始文獻彙編，來源於明清內閣大庫檔案，是皇帝及內閣大臣處理政務後留存的重要文件，史料價值較高。這些檔案長期秘藏於清宮，清末張之洞曾奏請焚燬，因世人呼籲，暫貯學部；民國初年，內閣檔案被裝進八千麻袋，險遭送紙店化漿造紙的厄運，幾經波折，損失不少。一九三〇年，知名學者陳寅恪、朱希祖、陳垣、傅斯年、徐中舒等人開始組織整理此項檔案，從中挑選一部份，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名義出版首編，分十冊排印綫裝。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又陸續出版乙、丙兩編。一九四八年，丁編編竣交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一年由中國科學院出版。此後，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根據運往臺灣的一百箱內閣檔

案，先後編輯出版了戊、己、庚、辛、壬、癸各編。

我們這次影印的，是臺灣所出各編，除將綫裝改成精裝、撤去每本版權頁外，一概保留臺灣版的本來面目，未作任何改動。因此書首編問世迄今，已踰半個多世紀，爲幫助讀者了解內閣檔案由來和原編體例，現將首編的蔡元培序、徐中舒內閣檔案之由來及整理和傅斯年明清史發刊例言及照片兩幅一併重印，置於戊編之前。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八五年五月

序

明清內閣大庫檔案及文籍之失散不知從何時起，但大批的失散是民國六七年到十年的事。這些檔案及文籍在大庫中雖然不是科學的排列着，但總沒有拉亂，沒有分散。不幸開始移動者缺少公心，不知史料的价值，一層一層的剝削，拿去宋板書，拿去好看的文件，而把最後的最大的一堆堆到午門端門門洞中。又不幸爲一個妄人賣了，幾乎走到唐山變做還魂紙。中間又經數年的展轉，纔於民國十八年夏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買入。公家舊物仍歸公家，其中損失已經不可計數了，但畢竟大部分依舊歸到公家，還是痛定後差可安慰的事。

這次買回在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具有甚大的決心，犧牲了甚多其他工作，然後成就。所有檔案不幸的歷史，及我們這次努力，已另有專文論叙，我在這裏亦提出兩個意思，以備同志者之留意，借當叙說這個「史料集刊」編行之意義。

第一 歷史中直接的材料與間接的材料有很大的分別，以前修史者之濫用間接的材料，而忽略直接的材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應該是以後治史學者所急當糾正的。例如遼史之成由于刪契丹列朝之實錄，刪芟實錄那能成信史？信史是要從檔案中考核出來的！這猶可說遼史成於胡元之朝，脫脫所領之局做不出學術上的大業，然試看馬班以後諸紀傳史家，那一位不是在那裏抄實錄，抄碑傳，那一位曾經充分利用過直接材料？我們展讀一部紀傳的史，每每感覺全是一些人名官名，千人一面，千篇一腔，一事之內容不可知，一人之行品不易見。這豈不是刪削實錄碑傳的結果，只剩了架子，而把知人論世的菁華遺略嗎？即使那些做實錄，做碑傳者，並沒有忌諱，沒有成見，沒有內外，已因和我們觀點之不同，他們所據直接材料以刪削者不正合於我們的要求，何況做實錄者本有所諱，做碑傳者本專務表揚，則有意的顛倒，乃至改換，是不可避免的呢！史料愈間接愈不可靠，這道理本是極明顯的。假如民國初年修清史者知道史學的要求不能以刪削官書碑狀滿足之，則這些大庫檔案正該由他們調去整理的，然

而他們不做。我們希望我們這次的整理檔案開些以後注重直接史料的風氣。史學本是史料學，堅實的事實只能得之於最下層的史料中。

第二 官府文籍和私家紀載在史料的價值上各有短長，合綜來各有獨到處，分開來便各不可盡信。大約官府的記載失之於諱，私人的記載失之於誣。私人記史事，由於親身經歷者固多，而最多是憑借傳聞，傳聞是容易失實的。人都不能無好惡，而私人立志記史事，自不免於感情的表率，故恰和官書的方向相反，而各不得其平。例如建文遺民之記遜國，明亡遺民之論虜事，其志可敬，其辭或不免過甚，這些反靠官書去給他打個折扣，然官府文籍多局於一類的事跡，不如私人記載之備各方面，且私著之沒有官府的立場，是最可寶貴的，所以私著畢竟是史料的大源。官府文籍中無論直接的史料如檔案，間接的史料如「國史」「方略」等，都因他只說一面的話，而有些靠不住，然而許多事究竟只有他去記，而且日月不苟，文件存列，我們可借檔案知道一事之最直接的記載。所以官府記載仍同樣不失為史料大源。守質者懶惰者專依賴官書，好奇者涉獵

着專信些私家不經之談，都不算史學的正軌。我們相信官文和私記「合之則兩美，離之則兩傷」呢！

我們整理這些檔案，在將來可以有多少成績，目下全不敢說，只願做這事業的精神，引出些研究直接史料，比核公私記載，而不安於抄成書的同志。這便是我們最大的安慰！

蔡元培

內閣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

徐中舒

內閣檔案原爲清代內閣大庫所藏，據羅振玉氏刊印的內閣大庫檔冊（原書在玉簡齋叢書內，總目下注「大庫官鈔本」，未詳編定年月），庫共編六號，禮樂射御四庫所藏，全爲檔案。從時代上可分爲三類：

- (1) 清檔 爲清代入關以後的一切案卷、圖冊、碑記、試卷等。
 - (2) 盛京舊檔 爲後金天聰崇德間的文件，清初由盛京移來。
 - (3) 明檔 爲清初徵集的天啓崇禎朝的檔案，及舊存的實錄、誥勅等。
- 檔案之外，書字庫所藏爲各省府縣志、賦役書、命書，及硃批諭旨等。數字庫所藏爲明文淵閣舊藏諸書，及清代鄉試錄、試卷、八旗通志等。

書數兩庫書籍，現存北平圖書館。檔案現除分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外，還有不少的散入私家了。

清代內閣在雍乾以前爲國家庶政所自出之地，在雍乾以後猶爲制誥典冊之府，所存檔案都是當時構成史蹟者自身的敘述。雖不免帶些官家的誇張，究竟還是第一等的史料。

康熙以來迭興文字之獄，再申禁書之令，其慘酷直爲前史所未聞。他們對於自己的實錄，不憚一改再改，對於明清之間的史料，不憚爲大規模的焚燬。據兵部報告，自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七年，銷燬次數計二十四回，書五百

三十八種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部。此項禁令至乾隆五十三年，尙嚴諭遵行。明清史料在這樣禁令下所受的損失，簡直是無從估計。但我們現在還得保存著這僅存的內閣檔案，使那些已湮沒的，已塗飾的史蹟，還得這些直接史料爲之比勘，這真近代史上最可欣慰的事！

清宣統元年大庫屋壞，移所藏於文華殿兩廡。兩廡地隘，不能盡容，那些不及遷移的，就聽其累積庫垣內，這雖沒有什麼大損，但也零亂得不堪了。那時張之洞以大學士軍機大臣管學部事，奏請以大庫所藏書籍，設學部圖書館（今爲北平圖書館）其餘檔案，閱議概以「舊檔無用」一奏請焚燬。只這焚燬檔案一事，可以想見清代閣僚知識的淺陋。而這許多貴重的史料，也幾乎輕輕地被這四字斷送了。那時羅振玉氏以學部參事被派赴內閣接收書籍，他因此看見庫垣內文卷山積，都是奏准焚燬之物。據觀堂集林庫書樓記說，羅氏那時偶然在許多檔案中抽出兩束來，一管貞幹督漕時奏摺，一阿文成征金川時所奏，兩者日月銜接，具有次第，都是近世史上最可寶貴的史料。他因此請於張氏奏罷焚燬之舉，將所有檔卷統歸學部分藏兩廡，案卷之類置於國子監南學，試卷之類置於學部大堂後樓。於是這內閣檔案，纔得暫免於厄。

民國二年教育部設歷史博物館籌備處於國子監，五年移於午門端門，移南學及學部所藏的檔案與試卷於端門內洞中。那時的歷史博物館經費既然短絀，主持又不得人，他們得了這鉅量檔案，實在也沒有什麼好的方法來處置。他們僅將這檔案中比較整齊的檢出若干，堆積午門樓上，鄧之誠氏古叢書記曾載此事說：

勝朝內閣紅本清冊時，貯麻袋凡口千餘，移午門博物院圖書館理之，司其事者部曹數十人，傾於地上，各執一杖，撥取其稍整齊者，餘仍入麻袋，極可笑！

這還是不整理的好，結果那些被屏棄的檔案，又幾乎斷送在部曹的杖下！民國十年歷史博物館因為經費的積欠，就將這杖下較破碎的檔案，裝八千麻袋計十五萬斤，以四千元代價出售於同懋增紙店為重造紙料。我們想教育部設歷史博物館來貯存檔案，顧名思義，總算很妥當的辦法；不料數年之後，歷史博物館為四千元竟將這檔案賣了！歷史博物館出賣檔案，而且買主是重造紙料的紙店，這豈不是大笑話嗎？

同懋增紙店買得檔案之後，取去麻袋，另備蘆席用機器滾水綑紮成包，（後來我們接收時，僅八百多麻袋賀表，未曾改包，）由火車分運定興唐山兩處，同時也零星賣出不少。羅振玉氏此時也在平市看見洪承疇揭帖及高麗王貢物表，以為大庫物，其友金梁氏並訪得這些庫檔統為同懋增紙店所得，遂偕羅氏往訪，由羅氏以三倍之值將原物買回。前運定興的現則運回北平，初堆置彰儀門貨棧，繼寄存商品陳列所大樓，再遷入善果寺餘屋。前運唐山的，現則運回天津，羅氏以寓居天津之故，特闢庫書樓藏之，於是這內閣檔案，纔得再免於厄。

羅氏兩次保存內閣檔案的偉績，即這內閣檔案已是紀念他了。不過這鉅量檔案的整理，傳布，以及永久保存等處置，終非私人之力所能勝任。羅氏當定興縣檔案運平寄存商品陳列所大樓時，也曾延招十餘人排日檢視，計解散八十餘包，以商部案遺商品陳列所大樓而止。天津庫書樓檔案，羅氏也略略檢理了一點，因就兩處所得印為史料叢刊初編十冊。（內太宗致朝鮮書，趙燕巖皮島諸將諭帖及天聰朝臣工奏議，乃瀋陽故宮舊檔，說見內藤氏

讀史叢錄清朝開國期之史料附記及趙爾巽氏滿洲老檔秘錄跋）羅氏在這部書的序裏對於自家這樣檢理的辦法，也很失望他說：

以數月之力檢理其千百之一二，沈乙庵尙書聞而欣然函問何時可畢事，予報書曰：「檢理之事，以近數月爲比例，十夫之力約十年當可竟，顧檢查須曠宅，就理者須部署度置，均非建專館不可。願以前稱貸既竭吾力，將何從突兀見此屋邪？即幸一二年間此屋告成，天假我年俾得竟清釐之事，典守傳布，又將於誰望之私意此事竟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及。」

羅氏這時或以財力的限制而中止其檢理的工作。內閣大庫檔案訪求記說：「外人且重金求讓，」羅氏或也不免要爲所動。這時寓居天津的李盛鐸氏聞知此事，急以一萬六千元購於羅氏。李氏爲國內有名的收藏家，所藏宋元以來珍本書籍及敦煌卷子極富，他對於這秘藏的內閣檔案，自然要感到很深厚的興趣。不過檔案在李氏處爲日頗淺，覓屋堆存已很困難，在天津的初由庫書樓遷至某家大院，繼又遷至謙信貨棧，在北平的也由善果寺遷至遼安伯胡同頂銀胡同兩處，數量既多，每遷一次，動須旬日。既遷之後，又只見檔案充盈絕無片地可供整理之用。因此他除檢視一兩袋外，也就沒有翻動了。雖然，這內閣檔案當時未曾流出國外，李氏保存的功績，也不可埋沒的。

歷史語言研究所設置於民國十七年，很想利用我們可達著的直接史料，（當時的遺物或記錄）做點研究的工作。其年十二月由馬衡氏之介紹，開始與李氏接洽購回事。旋議定以一萬八千元爲代價，蓋即李氏原付價及其歷年爲此所出之房租等。現在公物雖仍爲公物，但包紮、遷移、塵埋、濕爛、鼠嚼、蛙蝕、種種損失不計外，在歷史博物

館賣出時重十五萬斤，及天津檔案裝車運平時，秤得約六萬餘斤，在北平的數量大約也相差不了，即散佚之件，合計已損失二萬餘斤了。

至歷史博物館堆積午門樓上的較整齊的檔案，也於民國十一年由教育部借與北京大學整理，計裝運六十二木箱，一千五百零二麻袋，現均整理上架，貯存研究所國學門。（計題本占室五間，報銷冊二間，雜件一間。）

官署案卷，清初稱為檔子，內閣有滿漢檔子房，內閣檔案中，有天聰時祝世胤奏本說：

臣奉汗命跟隨機兒哈貝勒，駐防海州四十餘日，除先擎奸細二次，見有胡述子榜什，大安榜什，「當子」可據。

榜什從漢語的博士出，意為文人。「當子」為榜什所掌，知是檔子的對音。楊賓柳邊紀略說：

邊外文字多書於木，往來傳遞者曰牌子，以削木片若牌故也，存貯年久者曰檔案，曰檔子，以積累多貫皮條掛壁若檔故也。然今文字之書於紙者，亦呼曰牌子檔子矣。

邊外用木簡書字，由來已久，這當因為邊外得紙不易，所以這種舊俗一直流傳到清初。東華錄順治二年內有一段記載：

令各衙門奏事俱繕本章，不許復用木籤，從御史高去奢請也。

這是清人初入關時事，從這一段記載中我們可以推知入關以前的奏事，明明是許用木籤的，奏事用木，所以檔字

從木。漢語稱木籤爲牌子，榜子，橘子疑是漢語榜子的轉音。後來與案卷連續並稱爲檔案。柳邊記略說貫皮條掛壁若檔，又爲後起的解釋了。

內閣制度的變遷，是很值得詳述的。明初承宋元舊制設中書省，置左右丞相統領衆職。洪武十三年丞相胡惟庸誅死，遂罷中書省。陳鶴明記說：

帝以歷代丞相多擅權，癸卯，罷中書省，分其職於六部，以尚書任天下事，侍郎貳之。

我們只看了這一段簡短的紀事，也就可以明白專制帝王的雄猜。他又於洪武二十八年再諭羣臣說：

朕能丞相設府，部都察院分理庶政，權歸於朝廷，嗣后不許復立丞相，臣下敢以請者，置重典……勅諸典章，永爲遵守。

竟頒這樣嚴厲的禁令！並且明白的說：「權歸於朝廷。」專制帝王總攬朝廷的一切，一朕即天下。這樣極端集權之下，自然容不了常侍左右而位高權重的丞相。不過在這樣大的國度裏，一衡石權書一壘竟是一件困難的事。後代帝王事實上不得不採用左右親信的人。於是那避宰相之名而處宰相之實的內閣，就應這種需要而起。明史職官志說：

中極殿大學士，建極殿大學士，文華殿大學士，文英殿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東閣大學士……以其授餐大內，常侍天子殿閣之下，避宰相之名，又名內閣。

在太祖時大學士秩正五品，僅備顧問輔導太子而已。

洪武十五年初置大學士官，禮部尚書劉仲質爲華蓋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爲文淵閣大學士，典籍吳沈爲東閣大學士，使侍左右，備顧問。又置文華殿大學士，徵耆儒鮑恂、余詮、張長年爲之，以輔導太子，秩皆正五品，恂等以老疾固辭，遂放還。

成祖即位以後，內閣才漸預機務。

解縉之降也，權侍讀，命與黃淮常立御左右，備顧問，或至夜分，帝就寢，猶賜坐榻前，語機密。八月壬子，改淮編修，與縉入直文淵閣，尋改楊士奇編修，金幼孜、胡儼檢討，與侍讀胡廣、修撰楊榮同入直預機務。翰林官入內閣預機務，自此始。

內閣參預機務，且夕在帝王左右，因此就爲帝王寵任，與尚書並重。明紀成祖永樂元年：

帝以立春日賜解縉等金綺衣，與尚書埒。縉等人謝，帝曰：「代言之司，機密所繫，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書下也！」

數傳之後，權位漸降。嘉靖以後，朝位漸次至列尚書之上。明史職官志說：

成祖……時人內閣者皆稱檢講讀之官，不置官屬，不得專制諸司，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白。仁宗以楊士奇、楊榮、東宮舊臣，陞士奇爲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榮爲大常卿兼謹身殿大學士，閱職漸崇。其後士奇、榮皆遷尚書職，雖居內閣，官必以尚書爲尊。景泰中，王文始以左都御史進吏部尚書，入內閣，自後語敎

房制敕房俱設中書舍人六部（尚書）承奉意旨，靡所不領，而閣權益重。世宗時三殿成，改華蓋殿爲中極殿，謹身殿爲建極殿，閣銜因之。嘉靖以後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

這時內閣位次雖尊，但必兼尚書職銜，學士及大學士官階，仍只五品，與翰林稱同官。萬曆時重修大明會典，仍以內閣職掌附於翰林院下。清初翰林院與內閣官制屢有更改，清會典事例卷十一

天聰三年設文館於盛京，十年改文館爲內三院，曰內國史院……內秘書院……內宏文院……順治二年以翰林官分隸內三院，稱內翰林國史院內翰林秘書院內翰林宏文院。十五年改內三院爲內閣。大學士俱改內閣銜。十八年復改內閣爲內國史院內秘書院內宏文院，裁翰林院。康熙九年仍改內閣，另設翰林院如舊制。

雍乾以來大學士官階纔定爲正一品，位在尚書上。清會典事例卷十二：

乾隆十二年諭，向來郊壇大祀凡遇遣官恭代之日，大學士皆不齋戒陪祀。蓋因會典內閣載定例有武官公以下輕車都尉以上文官尚書以下員外郎品級以上之語，是以親王及內大臣大學士等皆不陪祀……若大學士乃政府之臣，以百寮表率，當敬謹齋宿以爲衆倡，何以轉不陪祀？揆厥由來，當緣明代大學士僅列五品，在尚書之下，文官以尚書爲冠，則大學士已在其中，其我朝雍正年間大學士既定爲一品，在尚書之上，則所稱尚書以下應改爲大學士以下。嗣後一應祭祀大學士等一例齋戒陪祀，將此載入會典。

內閣既居舊日宰輔地位，於是不免再引起了當代帝王的雄猜。雍正七年升大學士爲正一品，同時內閣職權也就